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聂付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晚明文人的 文化传播研究

张其成 著



中华书局出版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聂付生 著

文船人文印部

工：謝繼升責

局：謝繼升責

：許繼升出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附錄) 150000 02, 10000 0000000

(附錄) 150000 02, 10000 0000000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謝繼升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聂付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12

(新知文丛.第2辑)

ISBN 978-7-104-02623-5

I. 晚… II. 聂… III. 知识分子—文化—传播—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D693.71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055 号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王媛媛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623-5

定 价:480 元(全 3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国出版集团



目 录

序	(1)
前言 晚明文化传播信息网的形成与文人的作用	(13)
第一章 文化传播与晚明文人的文化理念	(23)
第一节 挥之不去的王学情结	(24)
第二节 “情”崇拜之风弥漫	(29)
一、“万物有情”:晚明文人的“情”意识	(29)
二、“情”之出口与文本宣泄	(33)
三、“情”的伦理化改造	(35)
第三节 休闲:文化传播心理的俗化	(40)
一、闲适:一种生活态度	(41)
二、尚奇:一种审美选择	(45)
三、媚俗:一种生活暗流	(48)
第四节 “为市民立心”:传播理念的一次革命	(52)
第五节 救世情怀:传播理念的回归	(62)
一、回归程、朱的圣学情怀	(62)
二、主实用的经世思想	(67)



第二章 晚明文化传播文本叙事	(70)
第一节 晚明文化传播观念的变革	(70)
第二节 虚拟传播语境下的晚明拟说书叙述方式的形成	(79)
第三节 晚明传奇创作的舞台定位	(90)
一、“缩长为短”的传奇体制	(91)
二、舞台化的语言设计	(94)
三、合律依腔:音乐体制的舞台化	(97)
第三章 晚明文化传媒及其机制(一)	(100)
第一节 晚明文化出版传媒	(100)
一、明代出版概述	(101)
二、晚明出版传媒的革新	(105)
三、晚明书商的经营模式及其意义	(112)
第二节 晚明插图本的传播机制	(116)
一、晚明插图本发展概述	(117)
二、晚明插图本的文本价值	(121)
三、晚明插图本的商业运作	(124)
四、余论	(128)
第三节 晚明藏书与文化传播	(129)
一、晚明文人的藏书情结	(130)
二、晚明图书的流通与管理	(133)
三、藏书与晚明文人的互动	(139)
四、余论	(143)
第四章 晚明文化传媒及其机制(二)	(144)
第一节 明代书院讲学的传播机制	(144)



一、晚明书院的兴盛与禁毁	(144)
二、晚明书院系统而严密的讲会制度	(149)
三、名家主讲的名人效应	(153)
四、书院讲义的大众化叙述方式	(156)
五、晚明书院传播功能的下移	(159)
第二节 晚明文学评点的传播机制	(161)
一、晚明文学评点之兴盛	(162)
二、晚明文学评点的文本价值	(167)
三、晚明文学评点的传播功能	(171)
第三节 晚明演剧的传播机制	(177)
一、晚明文人对演剧原则的把握	(177)
二、家班和民间团体在传播中的主体性作用	(181)
三、互动的文人、演员与受者	(185)
四、余论	(188)
第五章 世界视野与传统习惯:两种文化传播的心路扫描	(189)
第一节 “深契儒理”:皈依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189)
一、接受与阐释	(190)
二、本土化的传教新概念	(197)
第二节 “咸于晋接”:晚明士大夫的西学情结	(203)
一、人格认定	(204)
二、纠偏补缺	(208)
三、近代科学意识的初步形成	(213)
第三节 诘难:西学的另一种解读	(216)
一、造舆论,壮声势,铲除传教源	(217)
二、学理上的论证	(221)



第六章 晚明文化传播个案研究 (228)

第一节 冯梦龙、凌濛初:通俗文学传播的开拓者 (228)

一、拟话本:一种新的传播文本 (228)

二、改编:走向通俗的必由之路 (233)

三、“话须通俗方传远”:通俗文学的传播原则 (238)

第二节 毛晋:出版界的巨子 (241)

一、“孜孜矻矻”:毛晋的刻书生涯 (242)

二、汲古阁与文化传承 (246)

第三节 徐光启:中西文化交融的先驱 (251)

一、“会通”释义 (252)

二、翻译文本与文化传播 (256)

三、西学与科学研究 (259)

余论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效果评估 (263)

一、清初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263)

二、文学范式的巩固与新变 (272)

三、私欲膨胀:文化传播的副作用 (282)

参考书目 (287)

后记 (294)



序

张 兵

人生常会有许多意外之事发生，为付生兄的《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写序，就是我在几个月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件意外之事。说是“意外之事”，实在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因为在我看来，写序者一般都应为文化名家，或是著作者的学术启蒙者和长者，例如导师之类。总之，应是那些学术领军人和德高望重者，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很不适合做这件事，所以一直拖延至今，未及一字。

然而这次在杭州，又见到了付生兄。他再次恳切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看来他请我为其大著写序，乃是出乎他内心深处的真挚情谊。如此高抬我，再要却之也实在不恭了。

和付生兄的相识是在复旦园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哪是一个周二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看稿，推门进来一位精瘦的年轻人说是要找我。我请他坐后，开始了交谈。他报了大名，并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后，乃慕名前来，恭请指教等等。说着，他从肩背着的一只黑色书包中拿着一本装帧得很不错的新书《冯梦龙研究》递给我，非常恭敬地说是要请我指教。在 20 世纪末的那一段时期，我的学术关注中心一度集中在话本小说的研究方面，对编纂过话本小说经典之作



“三言”的冯梦龙自然十分感兴趣。现在看到这部学术新著《冯梦龙研究》，不禁对它的作者有了一种十分欣喜和敬仰的感情。由此也记住了“聂付生”这位同道的新学人。

大概是囿于学业的紧张，自此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付生兄也没来找我，我也没有再见过他。然而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惦记着他。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知道他来到了杭州，供职于一所传媒学院（如今他被著名的浙江工商大学作为人才引进）。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丽的西子湖，和他钟爱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如此的契合，大自然必将孕育这位学子的新的创造力。我衷心祝福他在学术征途上继续前进。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杭州后的第一个春节的除夕夜，就打来长途向我们祝贺新年，并告知准备来沪上门拜年。大年初二那天，天气很冷，又下着小雪。付生兄践约来了，而且还带着他的太太来的，这使我们大为感动。邀他在沪小住几天，被他和太太婉拒。看到在雪花纷飞中远去的付生兄夫妇的背影，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在春节时从异地来家拜年的，记忆中付生兄是第一人，而且是和太太一起上门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我是打开了多年珍藏的茅台酒招待他们的，也算是表示了一点心意。

此后的每年春节，他都带着太太来看我们，平时也常常通过邮件嘘寒问暖，聊聊家常或工作以及遇到的困难和人生的困扰等等，乃至我几天看不到付生兄的邮件，心里就会很难受。也正因此，担心和他心心相印的我，在写作时笔下会带有主观的感情，从而影响读者对此论著的正确评判。——而这也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如今我却改变了主意，因为记录下这段朋友间的情谊，也正是我的责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在人生的交汇点上，或是人生的驿站中，一个真诚的朋友有可能会改变人的命运。从付生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有一次，我和他的老师之一的李时人教授夫妇曾有一次聚餐，席

间说到过付生兄,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从以上一点短短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所说的精准。在我看来,“实在”两字非常精当地概括了聂付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的“实”,是指老实。做人作老实人,为文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而“实在”的“在”,乃指“在理”。做人处世懂礼貌合公德,为文讲求实证,用证据说话,不矫饰虚伪。而这一切,却正是聂付生的特点。文如其人,为人实在的付生兄,为文也很实在。不仅是为文,做学问也是如此。这部《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一书,是聂付生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两年的精心撰写之作。我在认真阅读后认为,可用立意新、把握准和视野广这九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

下面分别试说之。

立意新,这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留给我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清初有位著名的文学家李渔在谈到戏曲的创作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立主脑”。这“主脑”正像电脑主机中的芯片那样,是一部戏曲的灵魂。其实,何止是戏曲,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有其“主脑”在,而且这一“主脑”应该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渲染得以鲜明的树立在其中。我想,学术论著的撰述也应该如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应当在作者的论著中表现得尤其鲜明一点为好。因为与崇尚含蓄蕴藉的文学作品不同,学术论著更加讲究清晰明了。著作者在书中所要传达给读者的观点应是明确无误的,它反对晦涩隐约,曲里拐弯,唯有如此,才能让读者充分地折服和接受。

这部论著题作《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毫无疑问,全书的“主脑”,或者说是全书的灵魂和重点是在“文化传播”四字上。所谓文化,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智慧结晶。在历史的前进中,文化也处在一个不断地嬗变的过程中。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本来多元的文化在和社会上诸般事物的遇合、碰撞、冲突、融合的长期“化学反应”之中,也不断地获得了前



进的驱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动态的变化而不是凝固的停止,是文化永远的特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始终认为,“传播”本是文化自身的题中之义。它在文化的动态前进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文化的传播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是搅动文化活水的内驱力。

也正因此,研究传播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在西方学界早就是一种非常热门的学问,也形成了一门享誉四方的学科。然而,在我国,“文化传播学”的真正得到重视,只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在作者撰写这部论著的时候,国内的“文化传播学”基本上还处在起步的时期。我们能读到的相关书籍十分有限。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陈列的大多是学者们翻译的外来著作,属于我们自己的、经过认真研究的论著寥若晨星,更不要遑论哪些系统阐述“文化传播学”的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了。所以他选择“文化传播”作为在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的课题,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勇于攻坚的学术勇气。

作者在这部论著中所要研究的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这就更让人要刮目相看了。前几年,他集中于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研究,并有论著面世。冯梦龙,当然是属于“晚明文人”之列,这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学术“转型”似乎是顺理成章和轻车熟路的。可是,从冯梦龙的个案研究走向“晚明文人”的群体研究,其间又要涉及到哲学、经济、甚至是政治等各个领域。就文化本身来说,除了小说之外,还有戏曲、散文等等,另有中国出版史、印刷史、教育史乃至是网络传媒等方面知识的积累。这对于付生兄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两年时间,他可是全身心地扑进了图书馆,从早到晚,在孜孜不倦地吮吸着智慧的琼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论著,就是他的辛勤和汗水的见证。如今,当我捧读着这部论著的时候,眼前常会晃动着一个清瘦的学者的身影,在图书馆的桌凳上,似乎还会闻到付生兄留下的汗渍味。



艰辛的攀登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正如作者所言：此书“以晚明文人的文化心态作为晚明文化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针对影响晚明文化走向的几种文化心态如情本心理、王学情结、闲适的生活态度等一一剖析，以期阐述晚明文化形成的主观原因；然后，从传播方式的选择和传播媒体机制的生成等方面阐述晚明文化传播的内驱力。最后，以世界的视角进一步比较中西文人在传播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异，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对晚明文化的深刻影响等”，读完全书，相信读者都会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在历史上，我国的晚明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除了在整个历史之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外，还有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已经引起了学人们的注意，撰写了许多有关论述晚明社会的优秀的学术论著，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文学的更多。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是文化传播学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聂付生的这部《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是研究晚明社会文人文化传播学的第一部论著，具有学术拓荒的性质，充分地展现了它的前瞻性。其立意之新，足以启迪后来者的智慧，导引学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把握准，这是《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留给我的第二个极为鲜明的印象。历史已经证明：文化的传播几乎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同时发生的。以文学而言，诗的创作差不多和“歌”同步。人们在劳动中和劳动之余，需要渲泄各种各样的情绪，而诗恰能较好地表达这类情感。它产生后，通过“歌”的形式可以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文字产生之后，诗除了吟唱之外，还可通过文字（较早时，把诗刻在竹简上等方式）而得到传播。后来人们发明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文学的传播载体又有了新的更为迅捷便利的方式：书籍。这在我国明代之前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然而，蒙古人的铁蹄又严重地摧残了文化传播的各种机制，明初的严酷统治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使文化传播受到了不少负面的影响。这一切，直至晚明时代，才得到根本的改变。晚明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一个历史的



转型时期。迅速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古老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激荡于思想界的王学与传统的儒家陈规、追求自由和享乐以及个人独立的人生理念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遗存之间，总之，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开放和保守，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冲突。文人们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中经受了新的洗礼。各种思想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文化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除了传统的演剧、讲史、宣讲小说以外，出版传媒也呈现出少见的繁荣。书院讲学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文人结社的情形。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巅峰，插图本、评点本等等，都为这一巅峰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晚明时代的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切入点，无疑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把握准，首先就准在这一切入点上，它可以让作者充分地展现个人的学术才华，在十分有限的篇幅中，把晚明时代作为一个特定的个案，可以很自由地纵笔游刃其中，解剖那个时代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也正因作者把研究对象把握得相当准确，才为全书的较高学术质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还很鲜明地体现在书中的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之中。这一点，是对一部学术论著的基本要求，但有的人就是很难做到。他们不是无限拔高，就是极度贬低，忽左忽右，忽高忽低，主观随意，率性任情，视学术为儿戏，很不负责任。例如，在对冯梦龙和“三言”的评价上，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存在着一种无原则的溢美。有人不顾事实，把“三言”的著作权奉送给冯梦龙。而事实上，冯氏仅是“三言”的编纂者。尽管他在将 120 篇小说汇集后编入“三言”时对它们做过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但仅仅是艺术加工而言，而不是原作者和创作者。很明显，编纂者和著作者完全不是一回事。现经学者研究，所有辑入“三言”中的小说，只有《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另有五六篇小说有可能是冯梦龙创作的，但目前尚未寻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而只能存疑。除此以外的绝大部分“三言”中的小说，皆为书会才人或市井艺人所作，我们怎能将“三



言”的著作权一股脑儿地全部给冯梦龙呢？称誉冯梦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依据又在哪里呢？也有拼命贬低的例证。凌濛初是“两拍”的作者。书中的近 80 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他个人的创作。尽管他在创作中也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吸取了大量的题材作为创作的依据，但至今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否定他的著作权。然而有人却千方百计地贬低凌濛初的文学贡献，不是说他“反动”（因为他曾参与和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事实上不是如此。已有论文对此作了有力的批驳），就是说小说“缺乏艺术性”，等等，就是看不上眼。这样的“研究”，难道是公允的吗？

而聂著却避免了这种对学术很不负责任的研究。他是一个老实人，实话实说，实事实做，既不胡乱赞扬，也不任意批评，尽量做到有一说一，以事实说话，在我看来，大致达到了准确的评价。例如，对晚明文化，学界甚为流行一种观点，即在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以王阳明“心学”为核心观念，盛行着一股进步的晚明思想潮流。其基本的特点是：尊重人的个性发展、追求现世人生享受、强调心灵充分自由，推崇精神解放的不拘一格。这股进步思想潮流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李贽思想影响下，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文人，甚至结成社团，互相呼引，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趋向决裂的方向前进等等。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聂付生也接受了这些看法，但却又保持着很清醒的头脑，对时髦的流行的学术观点有独立的思考，绝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在首章的导语中有一节概括性的论述，可说是全书主要观点的结晶：“晚明文人生似乎都在解构中国封建文化，在觉醒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等方面做着努力，但是，他们往往又在解构的地方重新建构起一套旨在敦化社会风气的伦理道德。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态一直支配着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极不协调的‘二律背反’像李贽、何心隐辈以



死相争者,毕竟少之又少。大多数或回归传统,继续张扬程朱理学,寻求‘实学’救国的新道路;或缩于一隅,以文娛心、以文娛世,在一种悠闲自适的意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因此晚明文人的传播心态也呈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格局。”这段话说得多好呵!尤其是“但是”以后的一些看法,近年来我们已经很少能听到了,然而谁能说它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事实呢?类似这样的论述,在他钟爱的冯梦龙的评价中也能找到。这种对研究对象的“两分法”,无疑体现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种独立思考,有个人见解的研究确是我们应当努力提倡的。

诚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也是很不容易的。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只有在具备充分的依据后,我们才能大体做到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准确,评价公允。且不说“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吧,但至少应把结论建立在有确凿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持,作者在写作此书是这样做的,因而这部论著的学术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更多的例证已用不着我在此再多饶舌,看过此书的读者想必和我皆有同感吧!

视野广,这是我在读了《晚明文人的文化传播研究》一书后得到的又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据学者们的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三个“轴心时代”。我国的先秦时期和古代希腊时期,为第一个“轴心时代”。在此一历史时代中,中外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例如,思想自由,学术繁荣,诸家峰起,百花灿烂等等,有力地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第二个“轴心时代”,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代表,我国的晚明时期也正与其相当,两者的思想文化成果完全可以互相媲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轴心时代”在我国的时间不是很长,然而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聂著虽然没有提到“轴心时代”的理论,但在客观上却站立于这种理论的前沿来臧否晚明文化。为此,

作者特设第五章：“世界视野与传统习惯”，强调了“两种文化传播的心理扫描”，认为我们在研究晚明文化的传播时，千万不可忘记了西方文化对它的深刻影响。当“我们考察明末中西文化传播时，首先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动态的、互为影响明文化现象，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剔除一些因民族情感而生的感性因素，正确认识晚明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人在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学术走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然而他认定，异质文化的这种交融工作是以接受、认同中国文化为起点的。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为我们带来了先进文化，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布道生涯也是穿上儒服进行的。要把一种异质文化传播到本土，传播者首先得适应和了解本土文化，对本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须作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先求生存的基础上再求发展，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论述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也正因此，我们读聂著，就如同在品赏学术的美味佳肴那样，有一种回肠荡气和回味无穷的感觉。

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晚明文化，两者的交汇和融合一目了然。即如晚明时期的杰出思想家李贽而言，就和利玛窦有过密切的来往。他的以童心真性为核心的思想体现中，不时闪耀着西方先进文化的光彩。聂著正确地指出了晚明文人心中的深深的“西学情结”，把他们的思想文化心态和西方世界结合起来，打开了一条晚明文化和世界文化联结的通道，这就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及时地呼吸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空气。聂著如此宽广的学术视野令人想起了一个真理：文化不仅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没有世界的文化，怎能奢谈民族的文化？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聂著专设“中西文化交融的先驱”一节，以徐光启为个案，对晚明时期的一些先进知识份子在传播西学中的历史贡献作了认真的论证。他们凭藉文人的敏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并且通过翻译文本的方式把它们引进中国，让更多的国人接触和感受当时的先进文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实践中学习先进的科学